

目 录

乐山川西师管区起义纪实·····	丁晨滨 (1)
眉山解放侧记·····	王澂熙 (10)
马边土匪暴乱记·····	龚定海 (13)
洪雅解放前后革命斗争回忆片断·····	何伦元 (21)
李蓝起义军在犍为·····	帅华光 (27)
血战眉州·····	万 骏 (36)
桥盐史话·····	郭昭明 (51)
解放前犍乐盐场官商勾结略述·····	张端甫 (68)
抗战期间“盐务总局”迁移五通桥简况·····	徐雨深 (89)
抗战时期乐山地区的粮政·····	糜德昭 (95)
解放前后五通桥的卫生事业·····	王叔堪 (103)
乐山哥老史话·····	毛学林 (111)
青帮在乐山的组织和活动·····	先碧如 (122)
王麟生事略·····	吴有清 (129)
剑桥吟·····	戴 廉 (136)
海外长歌行 拳拳报国心·····	王永琦 (138)
明代古镇罗城镇名的由来·····	王宗正 (139)
“小西湖”的由来·····	朱毅夫 (140)
沙湾和平解放史实·····	徐文同 (143)

乐山川西师管区起义纪实

丁晨滨

风云紧急 人心思变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间，风云紧急，人心惶惶，西南各省已接近解放。

胡宗南部败退入川后，妄想据守成都，派其第三军军长盛文为成都防卫总司令。色厉内荏地嚎叫：“誓与成都共存亡。”颁布了“十杀”命令。每天派巡逻执法队巡行街上，杀气腾腾。成都市内每条街口都设置了木栅栏，夜晚九点以后就不准通行。伪保甲组织的团丁，都是些地痞流氓，白天狐假虎威，打骂百姓，抓拿骗吃，调戏妇女。夜晚，吆五喝六，枪声不断。白色恐怖的气氛，笼罩全城，再加上自进入十一月后，天天阴雨绵绵，寒风刺骨，街上泥泞难行，行人都缩肩拱背，慌慌张张，似有大难临头之势。

原驻成都的九十五军黄逸民部队，已在十一月下旬盛文第三军进驻前，连夜撤出成都，移驻彭县。原驻川、康各地地方军正向解放军联络，积极响应党中央号召，举行就地起义。

就在这一天天吃紧之际，我们驻在乐山的川西师管区内部，也在酝酿着变化。

川西师管区下设三个团管区：嘉定团管区赵惠加任司令，简阳团管区高建中任司令，邛崃团管区卿承廉任司令。另外有两个补充团。川西师管区共辖十一个县，平时办理兵役，替国民党搜集炮灰，战时编为一个师，扩充部队实力（四六年以后，蒋介石为了打内战，设置了国防部兵役局，下设各省师团管区）。

我于一九四七年从成都第二十八军官总队调到乐山师管区司令部任少校军械官。背景是岳父段茂棠与乐山师管区中将司令黄占春是保定军校同学，我与副司令陈孟熙是黄埔先后期同学，另一副司令李彦生也是黄埔三期老大哥。加上我在成都“精诚学会”（即黄埔校外同学会，以校训“亲爱精诚”而命名的学会）被选为常务理事，可以联系一批黄埔校友。因有以上关系，故我在川西师管区深得正、副司令的信任，既有权，又掌握着武器、弹药、汽车、无线电台和有线通讯各种器材。正、副司令外出都由我亲自驾车迎送，因而得知他们不少的机密，也参与了一些内幕活动。

陈孟熙，黄埔四期毕业（陈毅元帅兄长），和我相处多年，情同手足，无话不谈。他和我早就通了气，互相约定：我们不去台湾，不去西昌（大陆上的最后基地），更不去打游击。一句话，就是决不与共产党为敌。

那时，我虽对共产党不了解，但感到大势已去，只有听天由命，盼望人民解放军早一天到达，战乱早日过去。继而又想：只是消极等待，也不是办法。以我们当时的境况看，也不可能消极等待。既不愿与人民为敌，就要积极准备起义。泾渭分明，必须认真选择。经过深思熟虑，我们选择了后者。我们估计在所能影响的部下及军校同学同事中，绝大多数的人是会倒向我们这边的。

撞臂挡车 妄图顽抗

就在这紧急的关头，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二十八日，黄占春、陈孟熙正、副司令，秘书朱融（民盟盟员），奉命去成都开应变会议，由我驾驶美式军用吉普送他们去成都。当行至成都外南红牌楼一带，平日宽旷的马路上，呈现一片混乱。车辆、人马拥挤得水泄不通，车挨车，车挤车，三步一停，两步一站，不到四公里路程，就开了两个半小时，才挤进成都。

当天我们住在中将参谋长谢崇阶公馆，夜晚秘书朱融就被警备部和特高组逮捕了。次日早上九时陈孟熙副司令去简阳团管区找高建中调动部队去了。我开车送黄占春司令去励志社（现成都商业街）开会。我穿着整洁的美式军装，佩戴着少校军衔，直冲冲把美式吉普开进励志社院内。看到戒备森严的样子，估计是大官在内。大门口八个宪兵分两边站立，一个宪兵连长带班值勤。看见我们小车，喊了一声敬礼，八个宪兵敬礼，我们在车上还了礼，车子不停地一直开进院内。

大厅前，看见阎锡山、张群、刘仁庵站在厅内。黄占春下车后向阎锡山、张群行了举手礼。刘仁庵走到张群面前介绍说：“这就是乐山川西师管区黄占春司令，他的一个秘书朱融被捕了，听说是民盟盟员。”张群恶狠狠地走到黄占春面前说：“你用了个共产党的尾巴当秘书，你知道吗？哼，等一会听候处理，等阎院长开完会再说。”当时黄占春吓得面如土色。

阎锡山身着黑色长袍，脚穿山西式牛鼻子布鞋，头戴呢博士帽，操一口山西五台县土话，很客气地向来自各方面的大官们说：

“你们坐，你们坐。”我发现在座的有邓锡侯、王瓚绪、谢崇阶、严啸虎、黄逸民、胡国泽等，还有一些大人物，我不太认识，也说不出名字。

这时阎锡山又操着山西五台土话说：“我们准备组织战地政府，与共产党周旋到底。抗日战争时，我们凭着四川大后方的人力、物力，打败了日本；今天我们也要利用四川的有利条件来消灭共军。我们还有这么多部队，连同地方部队，少说也有一百多万人。还有美国盟友的援助，有物资，有飞机，有武器。我们的戡乱救国，一定能够胜利。西昌和昆明是我们今后的空运基地，每天我们准备两百架飞机，来往于台湾、西昌、昆明之间，保证供给一切，你们要有决心。我和总统已经布置好了……”从表面看他好象决心很大，殊不知未出三天，他就先悄悄跑到台湾去

了。

当天上午在勵志社开完会，下午又到北较场中央军校校本部，听蒋介石讲话。北较场警卫更加森严，持枪卫兵里三层、外三层，并有校官带班值勤。我把车子开到大门外就不准进去了，黄占春司令只好坐着执勤小车进去听训。

我在北较场大门外坐在车上，心情是沉重、惆怅、空虚的。天阴沉沉、冷清清，刺骨的西北风吹得人寒而慄，点点雨珠斜打在挡风玻璃上叩人心扉。我望着北较场大操场上中正堂前蒋介石的铜像，虽全身披挂，手持日式腰刀，但似乎有点要向前倾斜的样子。我心中想：校长，你这个铜像，是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黄埔校庆时，军校师生捐款修建的，现在看来你要倒了。我们同学东征北伐赶走了日本鬼子，跟着你，却被陷入罪恶的内战深渊，挨了老百姓不少骂，我真不理解，这是为什么？听说共产党受老百姓爱戴，而我们却自绝于国人，弄得声名扫地，这又是为什么？为什么？

第二天上午，我开车送黄占春司令去中央银行。他领了一批“应变黄金”，我不知有多少。只见黄司令的儿子用两个大皮包装着。中午我们回到谢崇阶参谋长公馆。午饭后我独自开车上街想散散心中惆怅之情，在长顺街，碰见原九十五军汽车连黄坤元连长。他对我说：“你们（指我们川西师管区）怎么办？我们九十五军已向北平发出电报，欢迎解放军入川。我们听候改编。”接着黄连长又说：“你和你们司令很好，你向黄司令说，叫他快到彭县，由我们军部电台发电报到北平，响应西南和平解放。”我说：“我和陈孟熙副司令是没有问题的，就是不知黄司令是什么态度。”

我与黄连长分手后匆忙回到谢公馆，向黄司令如实地转述黄坤元的意见后说：“司令，我们是不是先到彭县九十五军去一下呢？”殊不知黄司令从椅子上站起来，举起右手厉声地说：“我

生是大总统的人，死是大总统的鬼，我不戴红帽子。”又说：

“你是总统的学生，校长蒋公亲手培育的军官，竟不知羞耻说这样的话！”哼了一声，指着我的鼻子严厉地说：“你把车子准备好，我们明天回乐山整理部队听候命令。”他这种怒发冲冠的样子，我们相处数年是罕见的。退出后我越想越怕，回乐山他会不会枪毙我？我想了很久，分析了各种情况。我已知刘、邓大军挺进大西南势如破竹，大势已定，他不会胡来吧？可是又提心吊胆，万一他要顽抗到底，对我必有所处置。我不得不防，就把左轮手枪准备好，到时来它个先下手为强。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三十日，我们从成都回乐山。一出南门，公路上更乱了，衣物、皮箱、烂汽车沿途甩起，根本看不见老百姓。溃败的蒋军和官太太们，象无头苍蝇乱撞乱飞，不知往哪里逃。我一面开车，一面心情沉重地想着回乐山后不知吉凶如何？

车行至新津飞机场门口，抛锚了，油管不来油。我忙下车照例拆油管、化油器进行修理。忽觉得有一只手轻轻拍在我的背上，回头一看，原来是飞行中尉邓世坤。他是我在任航校副队长时的学员。他初进航校时，过不惯紧张的军旅生活，情绪低落，想开小差。经我多次劝阻，才安心下来，故私感甚好。他中等敦实的个子，一身飞行服，满脸阴云，伸出沉重的手把我拉到车后十几步外的地方低声说，“我驾驶的C53型运输机，油都加好了，直飞台北，快走吧！”我说：“家还在乐山，我怎好单独走！”邓世坤说：“到了此时你还舍不得你的太太，真是庸人！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来时各自飞嘛！老处长陈有为，还有韩德辉总队长都在台湾航校，你怕什么？快走，快走！”我心想：大陆全完了，台湾又能保得住？只是迟早而已。去台湾又是寄人篱下，受美国人的气，我又何必呢！况且我听陈孟熙说郭勋祺原是国民党上将，被俘后弃暗投明，曾告诉他：解放区好得很，共产党对投诚的军校毕业生也很宽大。我又不是什么大官，我怕什么呢！邓世坤再

三劝说，我只答个“不走”。他见我很坚决，只好含泪分别。

我刚把车修好，就听见飞机吼声。我抬头仰望长空，一架C53运输机，在跑道上滑行，刹那离开地面，飞过我头顶，一个中转弯，再抖抖机翼，向南飞去，不久就消失了。这时我沉重、惆怅的心情是难以形容的。我只好开着车没精打采地继续上路，朝着乐山驶去。尽管千头万绪，心乱如麻，但我不去台湾是对的，对此我毫不后悔。

东方欲晓 顺应民心

那时新津河要过三道渡船，逃跑的军队，逃难的老百姓，人山人海。汽车、装甲车、炮车，和国民党的残兵败将，挤满河坝。人喊马嘶声，船工呼喊声，士兵叫骂声，官太太们埋怨哭泣声，交响回荡在寒冷空旷的河边，其声之凄惨，其状之狼狈，实不堪闻睹。为了抢先过河逃命，所有车辆争先恐后地向渡船上挤。只见军车乱冲乱闯，谁威风大谁就先过。我们也凭着势力，勉强挤上渡船，好不容易才渡过三道河岔，真正体会到“走遍天下路，难过新津渡，望着三道水，两眼泪如注。”悠悠的新津河，比平时更宽更深了。

傍晚回到乐山，到家一看也是乱成一团，东西家什都搬到我们合股开的蜀丰加工厂去了。这一夜好不容易才忙乱到天亮，听说重庆也解放了，我心中暗暗高兴。同时又得知成都绥靖公署主任邓锡侯已派谢崇阶参谋长来乐山，接替黄占春司令职务。我心中更踏实了，这样我的左轮手枪也就没有必要用了。黄占春在此一发千钧之际离开部队，他到落得个因祸得福，免得与解放军对阵，保住了他的老命。

谢崇阶走马上任，自然带来一帮人马。旧社会都是“一朝天子一朝臣”，我也就乘机装病不上班，把一些武器、弹药、汽车、汽油、材料等点交了。可是听说新任谢司令，还要留用我，并提

升为中校科长。我内心知道，这是送死的官，不想干，只想等陈副司令把简阳团管区人马全部撤回乐山再说。

殊不知，第三天下午驻乐山城内的国民党三三五师妄图与解放军打巷战，命令师管区全部撤出乐山城，到清水溪一带布防。在临离开乐山时，谢司令怕我投共，派一个姓李的中尉副官，带着命令来我家，命我随李“立即返部，否则就地枪决。”当时李副官劝我：“军械官，我们多年相处，还是同我返部吧！党国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你又是黄埔学生……”我本想趁部队离开乐山时就脱离部队，等陈副司令回来。看来，不敷衍一下不行，就随口说：“好吧，我们吃了饭一起走。”在等吃饭时，李副官把命令给我看了。我见李带着小“白朗林”手枪，可我两手空空（原有两支手枪已上交），又一想，身为军官还怕枪吗！我一直把右手插在裤包里，表示我也有准备，使李摸不透我身上是否有武器。我有意和李并坐在我家大沙发上闲谈，心想万一李先动手，我就和他力拼。以我那时膀大腰粗的身体，对李还是敌得过的。说话之间，天也快擦黑了。

红旗漫卷 乐山解放

这时从河对岸大佛寺一带，传来紧密枪声，乐山街上也人喊马嘶，枪声四起。我们细细一听，老百姓欢声雷动地喊道：“解放军真是神兵，这么快就打过来了。”我听后心中更踏实了，回头一看，李副官可吓昏了，面色苍白，叫我救他。我说：“如何救你，我也无把握，不过你应先把武器放下。”他只好乖乖地把小手枪缴出来了。

这晚陈孟熙也回来了，他把我叫去说：“解放军首长已与我接过头，叫我们赶紧写信劝部队回来。我已与解放军三十师马忠全师长、鲁大东政委接上头，代表川西师管区全部起义。”我和陈孟熙连夜写了六封信，先交给张力行首长审核修改，张力行

首长又拿的多份有关优待起义部队的文件叫我们连夜一同发出。

第二天清早，我找到原来驾驶兵陈端云、高祥明二人，每人由我私人付给他们三个银元作茶水费，叮咛他们：不管冒多大危险，也要把信和文件送给谢崇阶、李彦生正副司令及各团团长。陈、高二人即出发追赶部队去了。

信送到后，谢崇阶不愿返回，就带几个贴心警卫逃回雷波去了。李彦生副司令把部队所有人员及武器带回乐山，向刚成立的军管会和三十师报到。当时接待我们的是军管会张力行、王高北两位首长。在介绍部队情况时，陈孟熙就把我的一切情况和技术等一一向两位首长作了交代，这就为我后来没有参加起义军官集中学习，直接就参加革命工作起了作用。

不久后，我被分配在解放军二野第十军三十师供给处附属单位任机务股长，我受到首长教诲，看到解放后的新气象，也积极工作，日夜带领工人抢修机器、开汽车，我自己也去开车支前。

其后在乐山军管会和人民警备司令部王之章司令员的指示下，我又作了以下几项工作：

一、我对住在乐山的原川西师管区司令黄占春说服动员，使黄交出了在成都领的应变黄金和私藏手枪三支，汽车轮胎数条，以及一切公物。

二、把原川西师管区军乐队张队长找到军管会，把军乐队人员和乐器交出来，成立人民的军乐队，在五〇年庆祝元旦游行时还演奏了军乐。

三、对乐山街面上的散兵游勇和私藏武器者，也积极向军管会作了检举汇报。

四、对顽抗据守在乐山外围的胡宗南残部三三五师童师长也写信劝其率部投诚，不久他们也投诚了。

五、对原四川省保安一团杨威中校副团长（我在军校的同期同学，现在省民革）写信，劝说该团起义。杨威一向思想进

步，不顾易团长阻挠，坚决率领全团官兵起义。

这是我凭记忆所及对乐山川西师管区起义经过的概述。回顾在原川西师管区人员起义投诚中，人民解放军三十师的马忠全、鲁大东、张力行、王高北等首长，对我们启发教育，使我至今深记不忘。尤其是张力行对人和藹可亲、平易近人的态度，至今历历在目。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党给我平了反，安置在凉山州布拖县四届政协任副主席。为了我的问题能彻底澄清，曾给张力行首长写信，他立即批示回函。首长记忆力之强，对起义人员之关注，真使我终身难忘，在此顺致敬意。

眉山解放侧记

王激熙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七日的晨早，从黑龙场方向传来隆隆的炮声，预示着解放军快到眉山城。日夜盼望解放军早日到来的人民群众无比的兴奋，而国民党军政人员却吓得来丧魂落魄，大有天翻地覆之势。旧政府烧毁档案的火焰冲天，烂军遍街拉夫急于逃命。

当时盘踞在眉山城内的国民党游杂部队，有曾晴初的补训处，李诚的游击支队，汪杰的山防总队，以及地方保安团、水上警察队、县府自身的警察中队、自卫中队、便衣队等，共计不足四千人。这些人中的大部分，都是一些袍哥、土匪亡命之徒。反动统治者把这些社会渣滓拼凑起来，妄想以他们的垂死挣扎挽救其灭亡的命运。

在县城里，也有一部分人士并不坚决反共，但对共产党也没有认识。他们忧心忡忡，只力求找到一个自保之计。于是集议成立了一个有三十多人参加的“眉山县人民自卫委员会”，有的出钱，有的出枪，又成立了一个自卫中队，还虚张声势的在乡村拼凑了有名无实的三个大队。他们喊出的口号是：“为避免象红军北上抗日时期，刘文辉的军队火烧西昌城那样的惨祸”，实际上是为了保护各自的身家性命。但自卫委员会成立之后就面临一个困境。旧专员王刚毅强迫要在“自卫委员会”之上，加上“反共救国”四个字。委员中有的主张顺应官府，有的却坚持置之不理。幸解放大军来得快，才解了这个危。

与此同时，城中一些进步人士也迅疾行动起来。他们一面

派便衣武装人员从监狱里抢救出地下党员和进步青年帅祖尧、周国伦、李立哀等四人；一面用自卫武装控制着正西街经济区；同时，要求“自卫委员会”立即召开紧急会议。这些同志在会议上宣布把“自卫委员会”改为“眉山县人民解放委员会”，并按名具体分工，哪知会一完自卫委员会中的绝大多数委员都悄悄溜了。他们比国民党的军政人员和烂军跑得更快，有的跑悦兴，有的跑白马，结果解放委员会就只剩下四个人。当天上午十时左右，在那些该跑的都跑完了以后，人民群众却是个个眉开眼笑。有的说：“这条街从来就没有象这样洁白、干净。”有的说：“解放军要来了，人都伸展些了。”大家在冬天暖和的阳光下，呼吸一点新鲜的空气。就是在这个时候，解放委员会的牌子在现在川剧团的门口挂出来了。立刻，一批青年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主动地涌进了解放委员会，积极地为欢迎解放军而忙碌地工作。有的起草、印刷、张贴向群众解说解放委员会是做什么事情的宣传品；有的分头去发动群众撕毁、洗刷反动派的一些旧痕迹。大多数的是写标语，扎红旗，城内大街小巷的人家，都在打扫清洁、扎红灯。可是，当天下午五时左右，国民党用汽车运了一个团的兵力，掩护旧政府反扑过来，敌人在汽车上架起机枪驱散了北街清除、洗刷墙壁旧痕的群众。旧专员王刚毅扬言要放火烧掉眉山城来泄愤。为了避免不必要的牺牲，当夜解放委员会撤退到北门外金银山。

解放大军十八日下午逼进眉山县城时，敌人成了惊弓之鸟，一枪未发便向新津方向逃窜。居民们成群集队，手持红旗在南门外列队欢迎解放军。当解放军进城搜索到桂香街时，在现时粮站后院还躲藏有山防总队的李春芳大队，因惊慌失措走火，被解放军破门而入解除了武装。

眉山解放后，“眉山县解放委员会”的工作，一是把残留的旧政府职员集中起来，办好解放成都平原的支援工作；二是协助第十

军把逃窜在西山的国民党游杂部队收集回城，缴械集训；三是协助第十八军搞好一九五〇庆祝元旦有关工作。这些对于安定当时社会，支援解放大军，都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一九五〇年元月中旬，人民政府成立，解放委员会立即结束，留下一部分人组织粮秣菜蔬供应站，其他有关人员，政府都安排了新工作。

读者·作者·编者

一、《乐山文史》系乐山市政协内部刊物，除分赠外，欲需者可来函购买，只收成本费。

二、投寄《乐山文史》稿件，请交乐山市政协文史资料编委会。一经刊用，即致稿酬。

三、由于人手有限，来稿一律不退，请自留底稿。未定稿请勿寄来。

四、来稿刊用后，若作者未收到稿费，请来信询查。

马边土匪暴乱记

龚定海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中旬，在中共乐山地下党的领导下，民革王传猷同志所组建的川西南军区游击队第十六支队李秀华部积极行动，为马边的解放作出了贡献。

月底，解放军九十团二营和县长张绍先同志进驻马边。十六支队李秀华部则开赴乐山，进行整编。

正当人民欢欣鼓舞，庆祝新马边的诞生时，突然天空乌云翻滚，山雨欲来。

一、土匪暴乱开始

一九五〇年初，川西南即将全部解放，国民党有组织的抵抗被击溃了，但残余的特务与地方土匪、恶霸和封建反动会道门相勾结，趁我政权才在组建，社会还不大安定的时候，疯狂地反扑过来。在马边方面是以封建地主庄园式的“抗建垦社”社长吕镇华为首，扯起“反共救国军”的旗号。这帮匪徒和活动时屏山、雷波间的“川滇康反共游击总队”的匪首陈超联成一气，在马边和沐川间的广大地区大肆骚扰破坏，气焰极其嚣张。当时，领导上为了争取主动，缩短防区，集中优势兵力重点进剿，决定将马边县人民政府和九十团二营暂时撤出马边。

一九五〇年三月六日，王传猷同志奉乐山地委命令，率领已改编为马边县大队的李秀华部回转马边，接替二营撤离后的防务，伺机配合进剿土匪。

这时，吕镇华匪部的先头部队，贺盛华、章文炜部四个连约五百余人进至马边城南二十华里的官帽湾，进逼县城。

吕镇华系“国民政府”参军长吕超之侄，曾任国民党军旅长，所部武器装备较精良。他和县内反动势力早有勾结，此时委任县参议长刘祖彬为“独立师”师长，同时伪警察中队长王国藩和参议员王明春亦已加入匪部。在实力对比上，匪部显然占有优势。面临着这一紧急情况，王传猷召集县大队长李秀华和地方人士李俊、王余、袁伯和、肖泰鸿、张宏熹和向辉伍等在银行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按当时王传猷、李秀华的打算，先以一个中队护送城区百姓转移，其余两个中队防守应战，以待人民解放军主力回师合力围剿土匪。但与会的“地方士绅”们极力主张“以撤为善”，要求“以桑梓父老为重”，认为双方一旦打起来，县城一定遭祸非浅。王传猷同志沉思良久，考虑到：一则因敌众我寡且装备亦强于我；二则现有征兆，敌人在城内已有潜伏。激战一起，潜伏的土匪乘机内应，百姓遭难，于战也不利。通过电台，向乐山请示后，决定撤出县城。原政治部成员和马中部份进步师生立即到五道水碾朱思文家集中，再由第二中队护送经南马埂转移至雪口山，保住这个战略要地，控制粮食；其余两个中队则由王传猷、李秀华率领撤至沙田岗隐蔽观察匪情。我当时担任第一中队政工之职，亦随部队在一起。当夜为了迷惑敌人，打击敌人猖狂气焰，王传猷同李秀华商量决定，派遣一支小分队，夜袭小炮台敌人。经过一阵突袭，任务完成后，也于当夜撤至雪口山扼守。

二、瓢箪寺之战

雪口山位于马边西北角，背靠彝区。右与建华垦社连界，社长唐传华系成都天府中学学生，思想进步，倾向革命。四九年冬王传猷和王骥同志组织地下革命武装时，该社就将全部武装交由任俊辉同志带领参加我游击十六支队，编入第二中队。这是我们的可靠的同盟者。左与下溪乡接壤，该乡当时还在观望。前面是复

兴乡的官亭坝，地势险要可守。王传猷同志的指挥部设在雪口山场西的李坪。他亲自指挥布防，以龛箩寺为前沿阵地，由第一中队防守。我在该中队作政治工作。其余中队沿翻水坳一线至雪口山的土门子布防。

龛箩寺正面居高临下可以阻击进攻之敌，左可防御下溪方向来犯之敌，右与翻水坳我军阵地相应。我们进入阵地后马上构筑工事，相互鼓励，一定要坚持战斗，狠狠打击来犯之敌。战壕里“走，跟着毛泽东走……”“打得好来，打得好……”的战歌驱散了连夜行军的疲劳，鼓舞着战士们的斗志。三月十一日十点左右敌人开始第一次进攻，中队长邓子安，副中队长项佐卿分别在战壕里逡巡指挥。敌人无目的地放枪，中队长命令：“敌人不到跟前，没有命令不准开枪。这是敌人火力侦察，是佯攻，不要理他。”果真，不到一刻便毫无动静。过了约一小时，敌人第二次攻击开始了，火力较前猛烈。敌人采取轮番攻击战术，交替前进。离我阵地四五百米时，开始冲击。他们边冲边喊：“李秀华的弟兄们！我们是反共救国军王明春的队伍，你们过来吧！都是本地人，保证你们的安全，不要替共匪卖命了！”直到此刻，我们的机枪才喷射出仇恨的火舌，长短枪也猛烈射击。敌人骤遭猛烈的阻击，很快龟缩下去了。

马边山区的春夜，寒气袭人，天又下着濛濛细雨。在雨雾弥漫、天色昏暗里，山脚下出现了穿黄军装的土匪，影影绰绰地在蠕动。我们判断张文炜匪部已赶来配合王明春匪部，要开始第三次进攻了。果然顷刻间敌人的远射程机关炮、八二炮向我阵地猛射，炮弹在左后侧开花。冲在前面的土匪，端着冲锋枪在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嘶喊着：“活捉王传猷！土共快投降！”项佐卿同志下令：“顶住，不要当孬种！”同志们奋起还击。但敌人越逼越近，火力越来越猛；同时右侧翻水坳阵地上传来敌人枪声，显然敌人已迂回到我们的右后方，龛箩寺不仅孤立无援，而且有

被包围的危险。邓子安和项佐卿当机立断，命令：“一分队掩护，其余撤退！”

然而，不幸的是：在撤退中，由于敌人已经逼近，来不及收缩整顿，部队首尾不能相顾，致使部份队员失散，我也和队伍失去联系了。

三、隐蔽斗争

匪部入城后，吕镇华委章文炜为“县长”，派粮派款，大肆劫掠；同时，为了镇压人民，树立威风，将一些外来的无辜小商贩，指为“匪探”，随便加以杀害。整个马边城一时陷于恐怖气氛之中。

在此期间，匪部兵力除吕部先头部队章文炜、贺盛华的四个连，刘祖彬“独立师”独立一团王国藩一百五十余人，独立二团王明春部一百二十余人外，还有吕匪亲率来城的特务营，和陈超的副“司令”刘某所率的一个美式装备加强营。吕匪亲自带领匪军至石梁子、观音岩和荣丁桐籽林，扬言要进攻利店和沐川，这是匪势最猖獗的时间。

我和部队失散后，隐蔽了一段时间，又和王骥及其子王传俊取得联系。王骥住家在彝汉杂居地区的水碾坝，所办“三民垦社”有些武装，他和彝人关系很好；其左邻的“建华垦社”，也掌握着一定的武力。因此土匪在进占马边后，始终不敢轻易向水碾坝进犯。我同王骥研究，决定利用我和程文蔚的亲谊关系，回城去开展对敌地下斗争。程文蔚是马边人，原是王陵基的亲信，当过王七十二军的参谋处长，王作四川省主席时，程作民政厅秘书长、灌县县长。川西解放时，王一逃跑，树倒猢猻散，程文蔚回到马边。他标榜“中立”，既不倒向共产党，也不和土匪合夥，却以为家乡办点好事的名义，办了个义务小学，教师纯属义务性质。我籍程的关系作上了义务小学的教师，便公开在城里露面了。这时，原“川西南军区游击第六纵队政治部”的一些马中同